

工建石桥。可受限于技术水平，建了三年还没有建成。直到宋仁宗嘉祐三年（1056），蔡襄出任泉州郡守后，在他的主持下，相当于官方出面支持，继续建造，石桥才终于在嘉祐四年十二月（1057）竣工。洛阳桥无疑是那个年代的“大国工程”。桥建成以后，“南接漳广，北通江浙，往来于兹者殷”。既然此渡口本名万安渡，那么这新建的石桥也就名为万安桥。作为宋代知名书法家，蔡襄亲笔用楷书写下《万安桥记》，讲述了造桥之后，“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

因为建在洛阳江上，万安桥又名洛阳桥。这一与卢沟桥、赵州桥、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者，是我国第一座跨海梁式大桥。记者曾听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专家介绍称，千百年来，洛阳桥经历多次修复，现在的它有45座桥墩，500根栏杆石柱，所用石板板最长达11米，每条桥板重达数吨，最重的达10吨，基本恢复旧时模样。

南迁的客家先民修建洛阳桥，其背景正是当时长江以南大规模的开发，宋代手工业逐渐发达，泉州已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

## 向海而生

“宋元时期，多种文明在泉州交流碰撞，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美美与共，这对于今日的世界仍然有重要启示。”泉州申遗文本负责人、中国建筑史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晶如此说。在傅晶看来，10至14世纪，泉州港以“刺桐港”之名

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傅晶表示：

“泉州申遗成功说明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泉州呈现的中华民族长久的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交相辉映的发展过程，也体现了对泉州作为宋元中国杰出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杰出范例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的高度肯定。”

记者在泉州下属的石狮市曾经看到，石湖码头的岸礁上，千百年来，挑夫搬运货物所要走的石阶依然可见。高达36米的六胜塔依然屹立。塔身上的金刚、力士像，可以证明这是一座佛教古塔。有别于普通佛塔的是——这座元代古塔，是当年海船眺望得到的航标。“当时泉州市场的消化能力、转运能力、辐射能力都很强，客商在这里可以采购到任何他需要的货物。”十多年前，记者在泉州采访期间，曾乘坐相关部门提供的汽艇下海，在艇上远眺六胜塔，听闻这样的故事。“本地马姓、丁姓、陈姓、郭姓、蔡姓，不乏波斯客商的后裔。”

这些传闻，可以和洛阳桥、六胜塔等等互相印证，以证明泉州历史上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2020年，泉州城三个考古重要项目的发掘成功，则更进一步印证了泉州是中国人向海而生的初始之地，甚至可以说——重新发现了中国的海洋文明。2020年12月11日，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上，“泉州城的相地选址和重要建筑朝向与

泉州南外宗正司、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2020年德化尾林、内坂窑考古发掘收获”三项成果得以面世。

何所谓“外宗正司”？这是宋朝皇室掌管在外居住的皇室宗亲的机关。宋徽宗崇宁年间开设于南京——当时的“南京”位于如今的河南商丘南部。据史料记载，宋代“外宗正司”最终的办公地点是泉州。南宋为何要将如此重要的机关搬迁到泉州呢？原因在于“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将皇室宗亲349人迁居到泉州。为此，泉州古榕巷内的水陆寺以及周边，逐步建起睦宗院、惩劝所、自新斋、芙蓉堂，还有天宝池、忠厚坊等。这些都是管理、教育宗室特别是宗室子弟的场所。

在中国古代文化学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陈鸿彝看来，宋元时期，中华海洋文化已经走上以海外贸易为主干的全新轨道，与沿线各国公平交易，和谐共生。特别是到了宋代，设有市舶司的都会和高埠，开始像一串明珠撒落在沿海一带，其中，泉州继广州、杭州、明州之后，是第四个设置市舶司的都会。

宋朝元丰年间（1078—1085），朝廷颁发了我国第一个专项外贸法规《市舶法》，即进出口贸易法规。“它规定榷易院与市舶司责在招徕外商，发展外贸。”陈鸿彝解读，“其‘榷易’的基本办法是：外商船舶进入口岸

2020年，泉州城三个考古重要项目的发掘成功，则更进一步印证了泉州是中国人向海而生的初始之地，甚至可以说——**重新发现了中国的海洋文明。**